陆瑞光与中央红军签订《反蒋作战协定》前后

陆景川

在长征途中，共产党人和红军以民族平等为基准，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成功地争取到少数民族的支持，为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刘伯承在1935年5月22日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结盟，成为一段传世佳话。同年4月16日彭德怀等红军首长长征经过贵州时与布依族英雄陆瑞光彻夜长谈并签订了《反蒋作战协定》。

▶陆瑞光

“反对官府”的农民领袖

陆瑞光，本名陆天祥，1901年10月出生于贵州镇宁县弄染寨的一个布依族家庭。他宽厚待人，仗义疏财，深受百里乡间各族人民的信任与拥戴。镇宁山区地处滇黔通道的要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布依、苗、黎、汉等多民族聚居地区。当地各民族长期以来均饱受滇、黔军阀纷争的蹂躏以及当地官府的残酷剥削和压榨。20世纪20年代初，为反抗军阀压迫，陆瑞光组织农民武装，领导各族群众进行抗兵、抗粮、抗捐斗争，“反对官府”。1929年5月，陆瑞光率部一举攻克镇宁，并开仓放粮，将大批财物、粮食、布匹、盐巴分给各族穷苦农民。这一义举深得民心，并且使这支武装开始从散漫状态转变为组织严密的武装，不仅有师、团、营的建制，而且还有严明的纪律。他身边有30多人的护卫排，就是用来约束部队、维持法纪的。他每天早上都“集合护卫排，读总理遗嘱、唱国歌、布置任务”；其队伍除派富户纳粮外，不额外增加群众负担，如有下属敲诈群众，必受严惩。由于他维护各族群众的利益，爱憎分明，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陆瑞光的势力逐渐强大，被贵州军政当局视为“匪患之首”，必欲除之而后快。1934年，贵州军阀通过挑拨离间，引起陆瑞光和其他地方势力相互争斗，使其实力大大受损。

红军“三顾茅庐”

正当陆瑞光苦恼彷徨之时，传来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插云南，红军主力分两路西进，进入了安顺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要求红军指战员和红军战士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不得侵犯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同时红军总政治部在《红星报》上发表了《注意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的指示》，强调尊重少数民族及其风俗习惯，揭露国民党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隔阂政策，号召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起来革命，反抗国民党的统治。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由彭德怀和杨尚昆率领的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于4月14日从安顺县鸡场和紫云县的猫营进入镇宁。当时，军团首长对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提供的陆瑞光的情况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一支人数众多的同盟军，所以一到镇宁县沙子沟，就立即派人与陆瑞光联系，做争取陆瑞光的工作，决定通过他的配合，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消除民族隔阂，与各族人民建立亲密的关系，从而使这一地区的农民斗争与工农红军的作战有机地联系起来。

由于陆瑞光对共产党和红军缺乏了解，所以一听到“外乡军队”来了，便带着队伍隐藏在弄染寨后虎坐岩指挥部的山洞里，暗中观察。彭德怀等红军首长进寨后，派人先找到陆瑞光的侄子陆顺芳，提出此行的目的是前来拜会陆瑞光。陆瑞光听到后，就派与他长得有点像的连长伍国斌冒充自己前来应酬。李富春一眼看破，便笑吟吟地说：“你是陆司令派来的替身吧。”伍国斌只好拱手致歉。李富春又温和地对他说：“我们知道陆司令是条好汉，打富济贫，名声在外。我们红军没有别的意思，如今路过贵方宝地，只想和他交个朋友，借道过境，共同打倒反动军阀，北上抗日！”

伍国斌回山禀报情况，陆瑞光听后心中疑虑仍未完全解除，便又派文武兼备的副官张海宽下山，不料又被李富春识破。又听说红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加上红军积极做宣传工作，向各族群众讲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逐渐消除了疑虑。一天，正逢弄染的赶场日，陆瑞光换了一身农家打扮，下山混在赶场人群中间探听虚实。

在街场上，他看到红军指战员多在田坝、山头宿营，红军官兵平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他又来到自家屋前，见院坝里红军与民众云集，亲切交谈。此情此景，使他动容。他整整衣角，便往几位长官模样的人面前一站，朗声说道：“在下就是陆瑞光，我绝不与红军做对头，请贵军安心住下！”几位红军首长见陆瑞光性格开朗，深明大义，也有相见恨晚之感，双方握手致意。陆瑞光感觉红军待人以礼，亲如兄弟，心情特别痛快，于是吩咐挑米、拿肉、捉鸡、提蛋、抬酒来送到各个营地，慰劳红军。

与红军签订《反蒋作战协定》

4月16日晚上，陆瑞光设宴款待来访贵宾。夜深后，双方依然促膝长谈。杨尚昆向陆瑞光介绍了红军的性质宗旨、纪律、任务以及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陆瑞光不住点头。接着红军首长们又帮助他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提醒他不要上当受骗。一席话说到了陆瑞光的心坎上。特别是他了解到红军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不仅敢于同黔军作战，而且还敢于同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抗时，更是钦佩无比。

在红军首长的启发教育下，陆瑞光完全接受了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并与彭德怀、杨尚昆签订了《反对蒋介石、王家烈、犹国才苛捐杂税的作战协定》。红军首长除赠给陆瑞光一面“中国工农红军弄染工作队”的军旗、两挺重机枪、一挺轻机枪、36支步枪和多束手榴弹外，又赠送给陆瑞光一批军需物资，还商定留下红军营长方武先等帮助陆瑞光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敌后革命根据地。事后，红三军团首长立即就此向中央军委发了电报，汇报争取陆瑞光的情况，电文如下：

军委：

沙子沟百数十里，有夷兵约千，有师团营组织。一首领名陆瑞光，我们已与其订立作战协定，反蒋、王、犹国民党及苛捐杂税。留有一批伤病员，赠步枪三十六支，并留一批工作员。

彭德怀　杨尚昆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六日十七时三十分

中央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这份电报，弥足珍贵。

双方签署协议后不久，红军部队离开布依山寨，弄染男女老幼均出寨相送，挥泪与红军告别。陆瑞光带着20多个弟兄，亲自护送红军几十里走出他的辖区，并以300斤大米、100匹小布、200块川盐、100筐鸡蛋和5驮草药及草鞋赠予红军，还派人为红军带路架桥，使红军顺利通过布依山区，提前3天飞渡北盘江，西进入滇，蒋介石的“会剿”计划也因此破产。

播撒革命火种

红军离开布依山区后，陆瑞光在方武先等人的帮助下充分发动各族群众，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游击队”，陆瑞光为司令员，方任党代表，下辖三个团，近七百人。这支游击队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军的部分兵力，在策应红军主力西进云南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此后，陆瑞光、方武先领导游击队加强了与中共贵州省工委的联系，并联合了48个少数民族村寨和武装力量，在镇宁、紫云、关岭、贞丰四县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游击队以“无事归农，有事归建”的灵活形式坚持敌后斗争，更创建了有革命政权性质的“镇关紫边区人民抗捐委员会”。

在陆瑞光、方武先等人的艰苦努力下，当地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引起了国民党贵州当局的极度不安。国民党贵州当局视陆瑞光为心腹大患，急欲除之而后快。

1936年底，四川军阀杨森率军入黔，亲自率军到紫云、镇宁“坐镇”。12月26日，杨森突袭弄染寨，以“迎接红军过境”和签订“反蒋协定”的罪名抓捕陆瑞光。陆瑞光和方武先以及留下来的红军战士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最后因寡不敌众，陆瑞光身负重伤，不幸被捕，被押往紫云县关押。

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与威逼利诱，陆瑞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痛斥国民党反动派争权夺利、烧杀掳掠的暴行。陆瑞光预感到来日不多，遂提出了照相的要求，想给家人留个纪念。亲戚们就从安顺请来照相师，经过上下“打点”，在狱中为陆瑞光拍下了一生中唯一的一张照片。照片上，陆瑞光淡定自如，毫无愁容，显示了他胸襟豁达、视死如归的从容气节。

1937年1月，敌人将陆瑞光移解贵阳，并将他游街示众。陆瑞光面不改色，不断向各族群众宣传共产党人的革命道理。2月20日，恼羞成怒的杨森发布死刑《通令》，把陆瑞光押赴刑场。陆瑞光在刽子手的罪恶枪弹声中，倒在八角岩的旷地之中，时年36岁。陆瑞光虽然牺牲了，但是红军在布依族山寨、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播撒的革命火种并未熄灭，不久在中共地方组织的引领下，渐成燎原之势。

为纪念陆瑞光对人民所做的贡献，1989年3月31日，贵州省人民政府追认陆瑞光为革命烈士；同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其遗属颁发了《烈士证明书》。

（作者单位：贵州省文史馆）

新四军勇克日伪“模范工事”

贾晓明

郑潭口是坐落在江苏省涟水县东北30公里处的一个村庄，地处一帆河与完蛮河交叉处的港湾里。抗战时期，这里是水陆交通要冲，同时也是新四军淮(阴)海(州)、盐(城)阜(宁)两根据地的连接区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皖南事变爆发后，日军为切断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派伪军支队长孙礼陶，大队长王立珍、徐庆同率领800余人驻扎在郑潭口。这股敌人烧杀奸淫、作恶多端，当地群众恨之入骨，纷纷上书根据地党政军领导，要求新四军为民除害。孙礼陶也害怕新四军找他“算账”，便乞求日寇派来“堡垒专家”设计监工，又强征大批民夫，用了3个月时间在郑潭口据点构筑起“模范工事”——修筑了6米高的围墙(外围还设有多重铁丝网)和90多个炮楼、地堡、暗堡，工事之间都有夹壁墙或地道相连；中间设一座高约12米、直径约9米的水泥结构3层大炮楼，可容百人对外进行射击；同时还整备了通往临近据点的道路，以便受到攻击时临近敌人能乘车迅速赶来救援。工事完成后，伪支队长孙礼陶非常得意，竟四处扬言：“郑潭口固若金汤，稳如泰山，别说新四军，就是天兵天将也奈何不了我。”

1941年，涟东县地方武装对郑潭口据点发起两次侦察性攻击，大致摸清了郑潭口据点的火力部署和敌人援兵的行进路线。9月上旬，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二团在完成反“扫荡”任务后进驻涟东顾大楼，准备完成上级部署的拔除郑潭口据点的任务。

战斗前，三师师长黄克诚和参谋长彭雄亲自到二十二团，会同团长张天云、政委张池明、副团长童世民、参谋长尹捷峰、政治处主任陶励等对敌情进行了周密的分析并研究了具体作战方案，又从新四军军部借来了山炮1门以备二十二团攻坚时使用。

9月20日凌晨两点，二十二团和部分地方部队由彭雄、张天云带队出发，于15时30分进入预定战区，敌人毫无察觉。

17时，战斗打响。炮击过后，二营和三营推着“土坦克”作为掩护，迅速排除了铁丝网，分别向围墙上以及东南角、东北角的炮楼发起猛攻。战斗持续至20时左右，外围炮楼和碉堡被逐一攻克。

彭雄和张天云利用战斗间隙，研究了下一步作战方案。根据彭雄的建议，二十二团决定将预备队投入战斗，采取“两头对打、逐段打击”的战法，将敌人全部压缩进中心炮楼，然后一并聚歼。二十二团各部稳扎稳打，歼灭了各处夹壁墙内的顽抗之敌，又集中力量，排除地道中的敌人伏兵，至21日零时，完成了对中心炮楼的合围。

稍事调整后，二十二团发起了对中心炮楼猛攻。由于敌人工事坚固，手榴弹投在炮楼墙上不起作用，新四军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副团长童世民以下30多人负了伤，还有不少同志壮烈牺牲。

拂晓后，各处日伪军蜂拥赶来增援，沿途被新四军打援部队阻击，战斗十分激烈。彭雄接到报告后，立即前往指挥打援。张天云等经过研究，决定三措并举：从各连抽调优秀射手组成火力队，专门封锁敌人射击孔；同时抽出精干人员，组成奋勇队，在火力掩护下利用云梯夺取中心炮楼顶部；又派部分战士向炮楼下挖掘地道，准备以爆破的方式炸开炮楼一层地板。

战斗至下午1时，奋勇队终于登上炮楼顶，从上往下扔手榴弹，部分战士也沿着挖好的地道冲入炮楼一层，形势遂发生了根本变化。炮楼一层的敌人见状，冲出中心炮楼，企图突围，却被自己挖的水壕所阻，很快被新四军战士追上击毙。随着新四军发起政治攻势，二层、三层守敌很快放下了武器。伪大队长王士珍自知恶贯满盈，举枪自杀，另一个伪大队长徐庆同被活捉，而伪支队长孙礼陶竟在战斗开始时就从一条密道逃走(几天后被日军宣布“死亡”)。与此同时，彭雄指挥部队击退了援敌的进犯，押着俘虏30余人前来郑潭口会合。

此次战斗，新四军共消灭守敌、援敌近900人，救出受害群众100余人，一举拔除了日伪插入淮海、盐阜根据地之间的“楔子”，盐阜、淮海两个抗日根据地得以重新连接起来。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徐向前初识李德生

胡遵远

1930年2月，李德生还不满14岁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当时，红军队伍里武器非常短缺，即使有了武器，一般也会优先分配给老战士。李德生曾壮着胆子向指挥员要枪，指挥员却告诉他：“枪得到敌人手里去夺。”

当时，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红军战斗频繁。李德生作战勇猛、屡建功勋，很快分到了枪和10发子弹。不过，因为当时他身材还小，所以分给他的枪没有枪托。

不久，组织上调他到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团部交通排当传令兵。传令兵的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通信；二是警卫；三是参加战斗。李德生上任后，很快掌握了工作要领并多次圆满完成了任务；排长也很快给他换了一支小马枪，但这支小马枪也有损伤——枪上没有准星。由于李德生作战经验丰富，很快就摸索出无准星小马枪的瞄准方法。

一天，时任红四军军长的徐向前来部队视察，并亲自检查战士枪支、弹药的保管情况。一眼就看出有把枪“不对劲”，于是便问：“这是谁的？”

李德生回答说：“报告军长，是我的。”

徐向前于是好奇地问他：“没有准星怎么瞄准啊？”

李德生说：“让标尺的缺口对准枪管的正中，形成三点一线，高低再注意一点就行了。”

李德生报告完毕，徐向前便把枪拿过去试了试，见李德生年纪虽然不大，但却能如此熟练地说出射击的注意事项，徐向前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久，李德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转战川陕，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善于学习的李德生一次次往返于前线和指挥所之间，不仅圆满完成任务，并在战斗中不断学习，其军事素养日益提高。

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分前后两个梯队继续前进。当时，李德生所在团处于红军两个梯队之间，当接近彷徨镇时，团长孙玉清派李德生和一位交通队员到镇子里找向导。

李德生和王三春从镇东南走向镇口，看到两个行走的老乡神色慌张。李德生立即警觉起来，隐蔽前进，在街口拐角处，发现有部分国民党部队已从另一个方向进了镇子，后面还有部队陆续向镇子靠近。李德生立即对王三春说：“你快往前跑，告诉前面部队，我往后跑，报告团长，要想办法把镇子里的敌人消灭掉。”李德生飞奔回团部报告。团长当机立断，指挥部队和交通排抢占有利地形，向镇中敌人发起突然攻击。已通过镇子的红军得到消息后也折了回来，向敌人进攻。激战中，红军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部队的番号和部署后，一面继续战斗，一面将情况向徐向前等报告。不久，徐向前率领第二梯队赶到，组织兵力向聚拢于彷徨镇的敌人发起迅猛攻击，激战通宵，终将敌人击溃。战斗结束后，团长孙玉清向徐向前报告了李德生和王三春发现敌情及时汇报的事迹，徐向前听了不住点头，特别对李德生两人给予表扬。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六十九师解放溧阳之战

尹向东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三野十兵团二十三军突破镇江、江阴之间的国民党军江防，乘胜向纵深穿插。为切断沪宁铁路和宁杭公路，阻截南京的国民党军向杭州溃逃，23日中午，二十三军奉命向金坛、溧阳方向追击前进。

二十三军六十九师于24日天明到达金坛，在金坛南门截住并消灭了国民党五十一军一部，俘敌200余人。经审问俘虏得知，国民党五十一军已向溧阳逃窜。六十九师于下午4时出发，向溧阳追击。先头部队到达大浦港时，发现大桥已被敌拆毁，部队立即联络当地民众，帮助部队用木排架设浮桥。但当木排架到一半时，敌轰炸机飞来投弹，炸毁了木排。六十九师随即改变策略，决定采用船只渡河。

作战科高参谋带着一名侦察员来到距渡河地点三四里处的一个小村庄征集船只，接近村口时，天色已晚。高参谋两人进到村里，被几个国民党军的便衣围住，并被强行带到村中。原来，这里驻扎着国民党五十一军一个副师长率领的一个营，本想逃去溧阳，没想到大桥已被破坏，而解放军又随后追到，于是他们只好暂且龟缩在村庄。高参谋见到敌人头目，从容发起政治攻势，很快震慑住了这伙敌人。不久，敌副师长命令将高参谋等两人释放。

高参谋回到部队，向师首长汇报了情况。师首长认为：敌人能够放高参谋回来，说明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后路“有考虑”，于是果断命令六十九师连夜渡河，继续向溧阳追击，又命令师保卫科长吴文斗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前往收降村里的这股敌人。

25日凌晨3时，高参谋又一次来到小村庄，向国民党军官兵宣讲了政策，并督促他们认清形势，立即投降。在高参谋的教育下，村中敌人400余人全部放下武器，向吴文斗带领的一个班解放军战士投诚。

与此同时，六十九军指战员在江南人民的热情支援和坚持江南敌后斗争的游击武装的接应下，克服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的困难，于25日下午来到溧阳县城外。师先头部队二〇六团派出的侦察员，很快查明溧阳城内守敌的情况：敌五十一军后卫部队和敌县保安大队正在城内修筑工事。团首长当即命令部队战士化装成国民党溃兵，由北门混入城内。部队进入城内后，立即夺取城门，并迅速直捣敌人的团指挥所，击毙了敌团长。其他各部迅速跟进，向纵深发展，很快控制了城内各要点，另一部战士绕城赶到南门，截住了企图逃跑的敌人汽车30余辆。激战至20时，城内800余名敌人全部被歼，溧阳被六十九师解放。

六十九师进占溧阳城后，师首长立即命令部队在城南公路两侧占领有利地形，准备歼截由南京向杭州溃窜之敌。

26日拂晓，10余万逃敌果然向溧阳蜂拥而来。六十九师采取“正面堵击，拦腰侧击”的战术，一举消灭敌人9000余人。战至19时，敌人见夺路无望，只好绕道南窜，结果被赶到的解放军兄弟部队全部歼灭。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潘国定机组圆满完成“南线试航”任务

陶诗秀

1956年初，为了便利内地与西藏之间的交通联系，中共中央作出了飞机通航拉萨的决策。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中国民航局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着手准备试航拉萨。空军指派副师长韩琳等驾驶飞机负责从青海玉树至拉萨的“北线试航”任务，民航局指派飞行专家潘国定等驾驶“北京号”飞机负责从北京经成都至拉萨的“南线试航”任务。

飞行前，机组人员仔细研究了每一项资料，充分估计到高空云层中通讯导航会受到的各种干扰，剧烈的颠簸、结冰和强大的逆风等各种紧急情况，进行了各种复杂的技术试验和试验飞行，并制定了各种紧急处置方案。

5月26日，空军试航分队领队长机韩琳机组驾驶伊尔-12飞机5116号率先安全飞达拉萨当雄草原临时机场，胜利地完成了降落和再起飞任务。5月28日，空军韩兴华、韩占钧两个机组，分别驾驶5118、5105号飞机，安全圆满地完成了降落任务。

28日，“北京号”飞到了四川省西部的广汉机场，潘国定和机组人员准备从这里飞往拉萨。正当此时，空军北线试航成功的消息传来，让潘国定等信心倍增。

29日，“北京号”开始启动，潘国定全神贯注地倾听着隆隆的发动机声。同行的人员中，除了其他6名机组人员外，还载着两名电影摄影师、几名林业部的森林勘察员和一名记者。

一切检查完毕，飞机平稳起飞了。10分钟后，邛崃山的绝壁耸立在面前，潘国定驾驶着飞机升到6000米高度，在时速160公里的顶风中飞行。

积云越来越浓，飞机升到7000米高度，但仍未飞出云层，只好靠仪表指示来穿过这些云障。报务员报告已收不到地面信号，潘国定断定：这是由于云层中的静电干扰所致，一旦飞出云层，通讯联络即会恢复正常。飞机在零下17度的高空中飞行着，突然，右发动机发出一阵轰鸣声，潘国定发现螺旋桨的转速在急剧下降，进气压力骤降，驾驶舱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判断是汽化器结了冰，立即打开汽化器加温，20秒钟后，飞机果然恢复了正常飞行状态。

云开始消散，蜿蜒的康定-西藏公路上的一列列车队依稀可见。飞机再向西飞过金沙江，按计划准备降落临时“中途机场”。几分钟后，潘国定接到了降落通知，他沉着地把飞机降落在海拔4000米高度的中途机场上。

经过短暂休整，飞机起飞，继续向西南方向飞行。不一会儿，唐古拉山出现在视野。由于这一地带尚未勘察，领航员紧张地计算着地速、风向、风速，机组不得不一面飞行一面修改地图，潘国定则驾机小心翼翼地飞过唐古拉山口，进入西藏地区。

拉萨不远了。潘国定提醒副驾驶和报务员注意打开无线电导航台，因为高空风随时都会把飞机吹离航线。

飞机通过航程中的最后一道障碍——高达7300米的念青唐古拉山，进入开阔的山谷地带，这时拉萨当雄机场清楚地映入潘国定的眼帘。潘国定等人的心里激动万分，但大家依然努力控制住情绪，因为这里海拔4300米，空气稀薄使飞机速度加快，机组人员都紧张地注视着各种仪表。“放起落架，放15度襟翼，对正跑道……放30度襟翼，放全襟翼，着陆！”“北京号”稳稳地停在了跑道上。

当潘国定等走出机舱时，藏族同胞纷纷拥上前来，向机组献上了洁白的哈达，围着飞机撒下青稞，热烈庆祝“南线试航”的试飞成功。